

李商隐

1949—1997

主编 王 蒙 刘学锴

中国李商隐研究会编辑

研究论集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李商隐研究论集

(1949 ~ 1997)



主 编 王 蒙 刘学锴
副主编 陈伯海 董乃斌
张明非 黄世中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李商隐研究论集

(1949~1997)

李商隐研究论集
王蒙 刘学锴 主编
黄伟 封面设计

李商隐研究论集

(1949~1997)

主编:王 蒙 刘学锴

责任编辑:姜革文

封面设计:黄 伟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邮政编码:541001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36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5.625 插页:2 字数:666 千字

1998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1500 册

ISBN 7-5633-2523-9/·224

定价: 39.00 元(平)
45.00 元(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目 录

1	王 蒙	李商隐的挑战(代序)	(1)
2	马茂元	玉溪生诗中的用典	(10)
3	何其芳	《李凭箜篌引》和《无题》	(17)
4	马茂元	关于晚唐诗人李商隐的评价问题	(24)
5	吴调公	流莺巧啭意深深——论李商隐诗的风格特色	(33)
6	禹 苍	说《锦瑟》篇	(48)
7	刘盼遂	聂石樵 李义山诗说	(55)
8	陈贻焮	谈李商隐的咏史诗和咏物诗	(69)
9	陈伯海	略论李商隐的政治诗	(87)
10	程千帆	李商隐《锦瑟》诗张《笺》补正	(103)
11	徐朔方	论李商隐的无题诗	(116)
12	陈贻焮	李商隐恋爱事迹考辨	(131)
13	杨 柳	关于李商隐的江湘之游——李商隐 生平行踪考证之一	(166)
14	陈伯海	怎样看待李商隐的《无题》诗	(177)
15	刘学锴	余恕诚 李商隐开成末南游江乡说再辨正	(190)
	附:刘学锴	《李商隐开成末南游江乡说再辨正》补正	(203)

16	郝世峰	李商隐七绝臆会(七首)	(209)
17	董乃斌	李商隐悲剧初探	(230)
18	吴调公	李商隐诗歌在清代的余波绮丽	(247)
19	吴调公	论李商隐的创作个性及其时代折光	(264)
20	张涤华	李商隐诗里的修辞手法	(274)
21	王达津	李商隐诗杂考(之二)	(282)
22	傅璇琮	李商隐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297)
23	董乃斌	论樊南文	(316)
24	聂石樵	李义山诗商兑录	(336)
25	陈伯海	宏观世界话玉溪——试论李商隐 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	(351)
26	葛晓音	李商隐江乡之游考辨	(363)
27	周建国	试论李商隐与牛李党争	(382)
28	梁 枢	《锦瑟》新论	(400)
29	钱钟书	李商隐《锦瑟》诗解	(412)
30	钟来茵	唐朝道教与李商隐的爱情诗	(417)
31	张伯伟	曹 虹 李义山诗的心态	(439)
32	黄世中	李商隐《锦瑟》悼亡说新笺	(460)
33	郝世峰	《选玉溪生诗补说》前言(节录)	(476)
34	周振甫	《李商隐选集》前言(第一部分)	(483)
35	刘学锴	李商隐与宋玉——兼论中国文学史上 的感伤主义传统	(496)
36	黄世中	往复回环,潜气内转——李商隐诗复辞重言研究	(510)
37	蒋 凡	李商隐诗歌的艺术贡献与心理分析	(526)
38	董乃斌	精神自由的强烈呼唤——论李商隐诗的主观化 特征	(540)
39	董乃斌	李商隐诗的语象——符号系统分析	

	——兼论作家灵智活动的物化形式	(548)
	及其文化意义	(548)
40	王 蒙 雨在义山	(569)
41	王 蒙 通境与通情——也谈李商隐的《无题》七律	(583)
42	王 蒙 对李商隐及其诗作的一些理解	(594)
43	刘学锴 √ 古代诗歌中的人生感慨和李商隐诗的基本特征	(610)
44	刘学锴 李商隐咏史诗的基本特征及其对古代咏史诗的发展	(625)
45	梁超然 李商隐考略二题	(640)
46	梁佛根 义山诗的用典心理动因与中国诗歌用典的文化内因浅说	(647)
47	陈永正 《药转》诗与唐代炼丹术	(658)
48	王富仁 精神的形象与物质的形象——李商隐《无题》诗赏析	(661)
49	钟来茵 《谈艺录》中《锦瑟》为诗集序说发凡	(669)
50	王 蒙 混沌的心灵场——谈李商隐无题诗的结构	(676)
51	张明非 论李商隐诗的比兴风骚	(691)
52	毛水清 论李商隐与郑亚	(702)
53	周建国 李商隐桂管罢归及三峡行役诗探微——兼论证陈寅恪先生的一项假设	(718)
54	谢思炜 白居易与李商隐	(730)
55	余恕诚 李商隐诗歌的多义性及其对心灵世界的表现——兼谈李诗研究的方法问题	(747)
56	刘学锴 总结与创新并重——建国以来李商隐研究综述	(760)

57	张明非	李商隐无题诗研究综述	(771)
(812)	附录:	1. 1949—1997 年李商隐研究专著目录	(781)
(932)		2. 1949—1997 年李商隐研究论文目录	(783)
	编后记		(810)

李商隐的挑战

王 蒙

一 李商隐研究标识着文学观念的变化

我们在建国 47 周年的时候,召开李商隐研究会第三届年会。这虽然是个巧合,但也有它的象征意义。它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新中国成立了四十多年以后,国内掀起了一个李商隐研究的热潮,李商隐的作品日益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兴趣和重视。这并非纯属偶然。它与我们文学观念的变迁、发展、开阔和深化有关。

李商隐研究标识着我们文学观念的变化,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题目。中国人在文学价值的判断上是很独特的。自古以来就偏重文学的教化功能、兴观群怨的作用和对于“修齐治平”的影响。从正面意义上讲,那无疑是很好的。文章以济世为功效,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所以历来注意那些在道德教化上有强烈的内容,鲜明的倾向,忧国忧民的作品,叫做“不关风化体,纵好也枉然”。这与我们国家儒家入世的传统有关。重教化,当然没有什么不好。但另一面,就比较轻审美。重济世,轻个人。这个传统在世界上是一个很有特色的现象。写爱情写男女之情的作品,它一般不可能有很高的教化价值。但注释家们往往要把它道德化,或者模拟化,似乎只有这样才有价值。比如《诗经》里的“窈

窈淑女，君子好逑”，一定要其“乐而不淫，怨而不怒”、“思无邪”，把它释成爱他的君主，爱他的皇上（当然也可能是这样）。如此注下来，似乎中国的男人，爱的不是女人，而是他的国君。他的相思，他的思念，他是为谁而憔悴呢？却原来是为国君而憔悴。写香草美人、个人情绪，恐怕很难往那上面解释。但你要努力解释，也能扯得上。对李商隐写个人情绪的那些诗也不例外，也有解释成对国家兴衰的一种关怀的。当然，这是好意。

从风格上讲，中国的传统是重阳刚，进取，乐观，这当然也很对。但是轻阴柔，伤感。贾政教诲贾宝玉，最讨厌他讲一些个人感情，所谓“颓丧”。一说某首诗“颓丧”，这诗就完蛋了。

重内容。从来中国的文学就是重内容的，要求政治内容特别的好，这也很好，但是轻形式。尽管创作样式各种各样，有豪放，有婉约，但在总体倾向的选取上，我们的传统是有这个特点的，甚至可以说是带有偏见的。因此，李商隐的诗被贬低，是一个历史现象，并不是自新中国才有的，不完全是左翼文学理论所造成的。从“时贤”的著述及引用的材料来看，自古就有许多对李商隐的这类批评，说他比较凄迷呀，是艳词呀，或者比较颓丧呀，总之缺少一种积极入世、乐观进取、奋发向上、创业开拓、战胜困难的精神。如果用这种精神来衡量，李商隐就确实完了，没戏了。

因此，历来人们愿意推杜甫为“诗圣”。李白大家还能接受，因为他的诗比较“阔大”。中国人是喜大不喜小的，认为“大”代表了一种价值。就拿今天来说吧，参加会的不过二十多人，也要说“预祝大会圆满成功”，倘若说“预祝小会圆满成功”，就可能不礼貌了。再如称某人为“大人”，若是称其“小人”，那还得了啊。传统的文学观念，使李商隐的诗长期遭贬，往往倾向于存其一格，聊备一格，不可没有，也不可多有。

最让人没脾气的是这样一种逻辑，所谓“如果都成了这样怎么办？”那倒也是。所有中国的诗人都跟李商隐一样，悲悲凄凄，难过

得不得了,写出诗来别人不懂,自己也说不清楚。这怎么行呢?确实,我也这么想。我们有一个李商隐研究会很好,如果四周围皆是研究李商隐式的诗人的研究会,而研究李商隐的人也都是李商隐的这种性格,那也挺讨厌的呢。粘粘糊糊,纠缠不清啊。就做人来说,李商隐未必非常可爱。特别从组织部门的角度来看,确实不能重用李商隐这样的人,太缠绵了呀。当然李商隐也有很阳刚的诗,如“咏史”诗等,其中也有著名的警句。有一年中央的春节座谈会上,一位领导同志还引用了李商隐的诗“成由勤俭败由奢”。但李商隐最动人的传颂最广的诗不是这些。

解放后我们对李商隐的评价完全继承了这样一个传统。当然还有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这也是完全正常的,共产党是依靠发动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所以我们更喜欢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更喜欢“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更喜欢“苛政猛于虎”;更喜欢白居易的《卖炭翁》。还有杜甫的《兵车行》,当然后来《兵车行》也不行了,说是和平主义思想,没有说清楚支持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虽然是关于一位古典诗人的讨论,但它牵连着我們活着的文学生活,牵连着我们的读者、作家、文学评论家的内心生活。所以我觉得大家一起研究李商隐,有一点激动人心的意义,就是它使我们的文学观念更广阔了。

二 用更深刻更宽广的观点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

我们研究李商隐,对他的作品也有许多个人的兴趣,但我们并非想把李商隐做为一把尺子,来裁剪其他诗人,如说李白的诗太浅了,或者用李商隐来否定白居易,这都是不可取的。我们也不会主张给古代诗人排座次,把李商隐排到前三名,或是前五名、前十名。

我们的目的无非是对这一类型的作家,对他诗艺上的成就、诗学上的成就特别是其对仗的工整、用词的雅致、感情的丰富、表现内心生活的深度和探索诗歌与诗歌语言的可能性方面,予以充分的发掘、承认和推广。如果我们不是那么狭隘的话,还应该充分肯定李商隐研究照样也有其教育意义。李商隐的诗里,多数并不直接提出道德上的劝诫,劝善惩恶的主题不是特别明显,但是在目前改革开放,经济建设迅速发展发展的情况下,能够培养一种比较高雅的审美口味,能够非常地重视我们民族的文化珍宝,能够培养一种对于中国对于汉语文学的兴趣。

我认为恰恰是在唐诗宋词,特别是在李商隐的诗里,让你感觉得到汉字有多么美。汉字的语法不够严格,它比较有弹性,比较灵活。从法学的观点来看也许汉语有若干需严密之处。但从文学的角度看,反倒是它的优点。譬如说英语,英语的时态太清楚了。究竟是过去时还是过去完成时,是现在时还是现在将来时,是虚拟语气还是陈述语气,是单数还是复数,它都太清楚了。清楚极了,就没有诗意了。我曾经写过一篇小说叫《夜的眼》。不止一位汉学家在翻译这个作品的时候询问我:这夜的眼睛是几只眼?应该是EYE还是EYES?但是在汉语中,它可以理解为一只眼,也可以是两只眼,也可以是夜里冥冥之中的一种观察。可英语中的“EYES”,则是人的两只眼。所以说,汉语是诗的语言,而李商隐的诗则把汉语的功能运用到那么好的程度。读李商隐的诗,读中国的经典文学作品,把汉语的这种特色,这种韵致体味出来了,就会有“我的中国心”了,这颗心会不朽的。

前些年武汉重建的黄鹤楼,虽然尽可能地恢复原貌,但它的建筑材料等等都不是“原装”的,此黄鹤楼不是彼黄鹤楼了。但它仍然受到大众的欢迎。为什么呢?因为人们除了想看“原装”不朽的黄鹤楼外,他们的心里还有李白、崔颢等人关于黄鹤楼的不朽的诗作。岁月可以湮没黄鹤楼,还可以湮没其它许多古迹,然而有优美

的汉诗存在,有不朽的汉诗存在,黄鹤楼则不会灭亡,同样汉文化也不会灭亡,中国和中华民族也不会灭亡。要从更深刻、更宽广的观点来看李商隐的诗和李商隐研究。这样,我们就不会一定要从李商隐的诗中直白地读出例如“五讲四美”、“严打”等方面的意思。

我们新中国经历过许多坎坷,在成立 47 周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李商隐研究会,而且每两年有这样一次年会,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很高兴,也感到很激动。

三 “李商隐现象”是对文学传统的一个挑战

李商隐一生留下了大量的作品。试图对这些作品及有关的研究材料进行把握,我认为这是对我们文学传统的一个挑战。

首先是对文学创作的一个挑战。刚才陶文鹏先生讲了一些对新诗的批评。那些写新诗的人听了可能觉得并不那么公平,因为喜欢新诗的人也还很多。在诸多文学刊物订数年年锐减的情况下,诗歌刊物却稳中有升。一个人在 16 至 19 岁的时候,特别是一些大学生,大概都可能是诗人吧。但是无论如何,那些比较平庸的创作在李商隐的诗歌面前,应该感到非常惭愧。不仅是惭愧,反过来还应该感到惊讶:为什么李商隐在一千多年以前,竟把汉诗写到那么好的程度?

对文艺理论,对意识形态,对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李商隐的诗本身就是一种挑战。对教条主义,对至今仍然存在的文学的狭隘性,也是一个挑战。对我们的诗学文学美学的一些框架,一些概念,一些符号系统,也是一种挑战。

比如说创作方法,中国传统的文艺理论并没有一个严格的说法。充其量就是所谓写实、实意,这是讲绘画的,也可以说有一点创作方法。赋、比、兴很难说是创作方法,最多算是讲文体。

西洋的那一套创作理论,用来研究李商隐的创作,总觉得不是

特别够用。因为西洋的分得比较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神秘主义，象征主义，等等。李商隐的诗里，好像什么都有。当然我指的不是他的政治诗、咏史诗那一类，而是读者最感兴趣、最受欢迎的。那些抒情诗、无题诗。他有的句子非常写实，但有的句子写得也非常虚。还有用典，这在西洋的创作论中缺少研究，中国作家用典非常之活，西洋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我总觉得李商隐的诗中有一种唯美的成份。它表达的情绪是那样悲伤，那样颓唐，可他的用词又是那么华丽，有时甚至是非常富贵。他很少用一些破罐子破摔的寒伧的破烂的词，他是不搞审丑的。他用的一些词，如珠、玉、金、鸳鸯蝴蝶、桃花芙蓉，等等，非常地富丽，又非常地女性化。我们不但可以研究他描写的女性，而且可以研究李商隐的女性意识。他本人有时是用一种相当女性化的眼睛来审美，用相当女性化的词语来写诗的。按我们的传统，男人应该写大风，“大风起兮云飞扬”，觉得这属于男性。李商隐却写了许多女性诗。有些诗被公认为写狎妓的，但他写的并不轻薄，很少用轻薄的语言。柳永的诗有轻薄的语言，《西厢记》里也有，连《红楼梦》里也有，它们摆脱不了那种以男性为中心的把女性做为性游戏对象的心态，它们总要露出一种玩弄的味道来。但李商隐的诗里没有，相反比较体贴，例如他写嫦娥的诗就是这样。

苏雪林的小说，不能算是正式的李商隐研究，那是有关李商隐情史的一种外延。在中国古典诗人中，很少有像李商隐这样的现象。一生有许多爱情故事，又很婉丽，但又不是从一而终，矢志不渝，同时又不流于轻薄和玩弄。写出来的情诗是那么美，用美来节制自己的悲伤，用美来包装悲伤。这种节制和包装的唯美的过程，又使他不会一味地颓唐下去。所以他从不疯狂。古今中外写颓唐的作家比较多，颓唐的人总是带着点歇斯底里和疯狂。李的不疯狂，可能与美的节制颇有关系。

李商隐的创作心态，他的性意识，性心理，也颇值研究。他有

时候甚至有点性错乱,我非常怀疑这一点。因此说,李商隐的诗也是对文艺心理学的一种挑战。

如果说李商隐是唯美主义的,那么唯美主义往往总是和形式主义结合在一起。汉字做诗很容易做得美。它的整齐、对仗和音乐性,特别适合做对联。李商隐的对联有两种。有的是天成、那是最好的对联,比如说“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有的是他做出来的,比如说“梦为远别啼难唤”,这是天成的、诵出来的、没有毛病的,但下联“书被催成墨未浓”,虽然漂亮极了,然而不是做出来的,它和整首诗没有必然联系。是后配,不是原配。但他对的极美,他是运作形式的高手。

李商隐的诗里,有写实的,有写意的,有象征的因素,有心理的某种变化(心理的某种变异产品。讲他心理变态实在难听),有唯美的因素,有形式的,当然也有正常的。而从整个李商隐的诗来说,又不能做出这样的判断。记得叶剑英同志还引用李商隐的“雏凤清于老凤声”,用以谈干部“四化”和培养第三梯队的问题。从整个来说不好下那样的结论。

李商隐对接受美学也是一个挑战。长期以来在中国处于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是贬低李商隐,但很多杰出人物又非常偏爱李商隐。比如毛泽东,还比如郁达夫、张爱玲等。如果研究毛泽东,这也是很有趣的。毛泽东的文学生活有三个部分。一个是他的文艺思想,那是用来指导全党全国全军的。他的文艺思想是革命功利主义的,如他提出深入生活,与新的时代新的群众相结合等,非常地革命功利。这是有道理的。以他的地位,他的任务,当时在延安他必须这么做。他当然不能提倡大家都写李商隐一类的诗。但毛泽东文学创作的这一部分,是又一路。我觉得他的诗主要特点是言志,豪放,当然也不废婉约。但毛泽东对诗的爱好就有点稀奇古怪了,他爱“三李”,这种爱好是对他的文艺思想、文学创作的一种补充,三者并不完全一致。毛泽东最喜欢的还是李贺,他的诗意不

断地和李贺的诗意近和。所以在接受美学中,李商隐提出的挑战特别有意思。譬如说到懂不懂的问题,一般人们认为李商隐的诗难懂,可恰恰是这一类所谓难懂的诗家喻户晓。他的政治诗、咏史诗并不家喻户晓,读这些诗有时要不断地看注,注看多了还有可能越来越糊涂。而家喻户晓的那些诗,有的句子脍炙人口,快成为人们的口头禅了,如“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心有灵犀”等等,连大批判都能用得上,“×××与帝国主义和台湾的反动派心有灵犀一点通”。再如“夕阳无限好”也是,家喻户晓,非常地普及。如果说不懂,难道大家都在爱一些他们不懂的东西?不懂不可能成诵,不懂不可能普及。这是一个很值得一思的现象。

这里涉及到我们文学研究中比较习惯比较偏爱的所谓阐释的方法。但是对待文学,对待诗歌,和阐释同样重要的是感受。我所知的一些欧美的文学朋友,他们就非常注意文学的感受。我在报纸上看到这样一则报道:我国的昆曲剧目《牡丹亭》去德国上演,事前剧团做了很好的台词译文的幻灯片。要听懂台词,幻灯片不仅在德国需要,即使在北京演出也常常是需要的。因为音乐虽然很动听,但不知道演员嘴里出来的是个什么词。但德国的演出经纪人坚决拒绝,他们认为一边看戏,一边让打幻灯,是对艺术的一种侵犯,一种侮辱。他们只同意发说明书,让观众明白故事梗概就行了。因为人们是来感觉中国情调,未必要弄清每一个具体细节。感受的是中国的人物,中国的音乐,中国的情调。最初我们的剧团很担心,但演完之后,全场反应热烈。这就是感受的魅力。我在出访国外的时候,经常被邀请参加作品朗诵会。就让我用中文朗诵,没有翻译。我参加过的一个朗诵会上,有西班牙语、印地语、汉语、英语和法语等作品的朗诵。与会精通5、6种语言的几乎没有。但大家还是有所感受,有所交流。那么,什么叫读懂?我觉得颇值研究。这里我顺便说一下,张明非女士概括李商隐研究动态的时候,认为我主张李诗无解,我觉得我没有这个意思。我认为本来是很

明了的句子,每位读者都可以简单地解。如《锦瑟》中的“思华年”,字面意思很明了,本身就解了,说的就是爱情。当然,这并不是它意蕴的全部。把“思华年”解成爱情,再加以详释发挥,是可以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的解可以是无限的,而不是无有的。

我读李商隐的诗,最大的感受是他的诗都那么活着。反复地读,他的那些语词、那些诗,都变得活起来了。似乎它们还在那儿组合着,奔走着,跳跃着,它们像一组组彩灯似的,一会儿这里亮了,那里暗了;一会儿这里暗了,那里亮了。它们都通着电。

甚至可以说,李商隐的诗对文学史也是一个挑战。李商隐现象的出现,至少对我这样知识水平的人,还是感到有些突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们可以找到与他的诗在某些方面相似的诗,但他的诗却又显然完全不同。《红楼梦》还多少能查出些渊源来,受《金瓶梅》、话本等的影响。李商隐的出现,他诗中体现出来的艺术主张,到底是怎么回事?许多人喜欢李商隐的诗,受他诗歌的影响,比如郁达夫,但都没有办法和李商隐相比。所以有时候在李商隐面前,我感到我们文学的语言的贫困,阐释方法的贫困。如果用中国传统的那些阐释语汇,风骨呀,意境呀,等等,这些词语用滥了,也就失味了。如果用很洋的那种分类法硬往李商隐上拉,也显然不够。选取什么样的方法呢?这个题目就很大了。因为我们中国目前还没有这样一套东西出现。我们所拥有的,不是苏联式的,就是西方式的,再不就回到金圣叹的路子上去了。倘若搞批评点评的话,现在我们恐怕还不及金圣叹。

越研究李商隐,越感到这是一个挑战。我们有可能把李商隐研究做为一个契机,把我们整个国家的理论水平,文学史研究的水平,诗歌创作的水平,推进到一个新的境地。

(原载《文学遗产》1997年第2期)

玉溪生诗中的用典

马茂元

文学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唐代诗歌在语言艺术方面,杜甫之后有了李商隐,才发展到一个更成熟的境地。这首先表现在典故的运用上。商隐诗中有一部分是用白描手法来直接写景或抒情的,但也有一部分是用典。对于这些用典的诗,这去有人把它比成“獭祭鱼”^①,认为“用事深僻,语虽工而意不及。”^②但也有人赞叹其“精切不移,横绝前后”^③的。其实诗歌中的用典,是很自然的趋向。从语言艺术的角度来说,它正是文人制作的特色;在客观上是适应于唐代所通行的今体诗的形式而发展起来的。所谓用典,实质就是借古事来表现现实生活内容的一种手法。现实生活内容至为繁复,而诗歌的语言则要求精粹;特别是今体诗。如何概括最繁复的现象和感受,纳入于精粹的语言之中,安置在固定的短短篇幅之内,使之平匀妥贴,内容和形式统一起来,用典是重要技巧和手段之一。因为任何一个典故,都必然有其具体的情节过程,它可以通过作者和读者的共同理解来说明与之相类似的作者所需要说明的问题,大大提高了语言的暗示作用;同时,典故的本身,是社会历史现象的集中和概括,必然有它的典型意义。运用在诗歌里,可以丰富和扩大艺术形象